中國的文明與官僚主義

黃沫 譯
艾蒂安・白樂日 著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BUREAUCRACY

Etienne Balazs

史 學 類



23
新視野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中國的文明與官僚主義

黃沫　譯
艾蒂安・白樂日　著

中國的文明與官僚主義

作　　者⊙艾蒂安・白樂日著
譯　　者⊙黃沫
發 行 人／張英華
印　　行／久大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南昌路1段99～101號2樓
(02)3916010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3717號
總 經 銷／萬象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羅斯福路1段68號
(02)3568482
郵政劃撥／1492020～3林維青帳戶
訂書專線／(02)3916112
傳 真 機／3917307
排　　版／鴻霖電腦排版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海王印刷廠有限公司
初　　版／1992年3月
定　　價／200元
ＩＳＢＮ／957－41－0171－1

目　錄

序 ……1

導言 ……3

I　**制度篇**……15

1. 中國社會值得注意的方面 ……17

2. 一個持久的官僚社會 ……27

3. 中國的封建制度 ……41

4. 中國資本主義的誕生 ……47

5. 中國的集市 ……67

6. 中國的城市 ……75

7. 馬可波羅在中國京城 ……85

8. 中國四世紀和五世紀土地所有權的演變……103

9. 中國四至十四世紀的土地所有權……113

II　**歷史篇** ……123

10. 作爲官僚政治實踐指南的歷史……125

11. 中國的傳統與革命……143

III **思想篇** ……163
12. 曹操的兩首詩……165
13. 漢末的政治哲學與社會危機……177
14. 虛無主義的反抗，或神秘主義的逃避……207
15. 中國第一個唯物主義者……229
16. 王安石的一個先行者……245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序

艾蒂安・白樂日1962年訪問美國時，我們向他建議出版他的論文集。我們設法克服了他生來的謙虛，並擬定了一個計劃。文章由他進行初選，最後的目錄也在他於1963年突然去世之前一星期得到他的贊同。

這僅僅是白樂日教授大量著述的一本選集。其他重要的專題論文和研究，下面的導言將讀到。他的全部著作目錄和傳記，保羅・德米厄維勒教授正在進行準備❶，將在《通報》第51卷（1964）發表。

我們有幸能請霍普・M・賴特夫人擔任這本選集的翻譯。賴特夫人在倫敦大學受過中國學訓練，是白樂日教授的親密朋友，又是一位有經驗的翻譯家。在翻譯過程中，她經常與作者磋商，這種方便條件是別人所沒有的。在一些技術問題她還得到倫敦大學東方與非洲研究所教職員的慷慨幫助。紐黑文大學的張淑菊女士幫助書寫難字彙編索引，耶魯大學的詹姆士・米林格先生幫助編寫年表。我們感謝許多刊物的編者，允許我們重印這些研究論文。每章的第一個注脚，說明該文初次發表的情況。

本書希望引起英文讀者(包括一般的和專業的)對歐洲最偉大的中國學學者之一的思想與見識的注意。今天，它當然也是對這位學者的紀念，他的品格與學識對我們和我們的學生，如同對他在歐洲的同事和學生一樣，是一個巨大的鼓舞。

這本書的出版，得到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和耶魯大學東亞研究會的聯合贊助。我們希望可以把它作爲對一個偉大學者的致敬和國際合作研究中國文明的一個象徵接受下來。

哈佛大學　費正清

耶魯大學　弗里德里克·賴特

1964年4月

注　釋

❶德米厄維勒，漢名戴密維，法國漢學家，生於瑞士。1924—26年任我國廈門大學法文教授。——譯注

導　言

艾蒂安·白樂日（Etienne Balazs）在他1963年去世時，是國際中國學界一個主要人物。他專心致志於中國文明的研究已有三十年，本書收入的論文體現了他的主要興趣所在。他給這本選集取的書名，表明了他對中國文明的矛盾心理。一方面，他欽佩中國人的偉大成就：在人類歷史上建立了最持久的政治秩序；光輝燦爛的文學藝術；三千年黃金時代的建設者和改革者的創造性與足智多謀，他們面對人和社會範圍內所有的問題，往往作出卓越的思考。另一方面，他對人類爲這些成就付出的代價感到憂傷：正統觀念的壓迫；傳統家庭和教育制度中的專制主義；在法律、政治和控制社會的手段中表現出來的極權特徵。對中國文明的這種矛盾心理，反映在他的學術論文的字裡行間。論文充滿了對高貴者神話的懷疑，特別是對這個文明完美無缺的形象的懷疑，而這正是它的捍衛者們奉爲圭臬的。作者有高度的洞察力，能從國家意識形態的官樣文章和公家文獻中看到權力與利益的實際。作者與那些傑出的思想家——傳統秩序的批評和犧牲者——心神相通。

這種看法可以部分地用白樂日的傳記來解釋。他於1905年生於匈牙利，在對哲學的研究中對道教和佛教發生了興趣。他去柏林大學深造，進了已故奧托•傅蘭克 (Otto Franke) 的研究班❶。在那裡他暫時擱下他對中國思想的興趣。他選擇了一個與傳統漢學和政治史毫無關係的題目寫他的學位論文。他的與衆不同，引起了他指導教授的興趣。這就是他對唐代經濟史的研究❷。這至今仍是一項驚人的成就——在中國和日本的學者對這個領域進行開拓之前，歐洲人率先寫出的一本關於中國經濟史的著作。這項研究的一些基本觀點來自馬克思，其餘的來自馬克斯・韋伯❸，但它給今天的讀者以深刻印象的，是它對關鍵問題的分析獨具慧眼和將各種傳統資料批判地用於新的目的。

寫完學位論文之後，白樂日回到對主要的思想家的研究，在這個時期，他寫了現在收入本書的三篇論文：對曹操的詩的研究，論反對佛教的范縝和對改革家李覯的研究（第十一、十五、十六章）。也是在這個時期，他發表了他對海德（Heydt）男爵收藏的碑刻銘文的翻譯和研究❹，主要是佛教的。儘管這些文章寫得才華橫溢，却沒有能繼續下去。這時是希特勒得勢的年頭，白樂日積極參加了反法西斯運動。三十年代末，他逃到法國。當巴黎落入納粹手中，他再度逃亡，這次逃到當時尚未被占領的法國南方一個名叫莫沙克的小村。在這裡，他和他的一家生活在「地下」；他當農場工人，在警察襲擊趨於頻繁時就隱藏起來。一個認識他的人描述他們那時的生活情形：「在莫沙克，有五家難民，全村以收留和保護這些難民而驕傲，常常爲他們站崗放哨。憲兵通常是睜隻眼閉隻眼……但他們中有些是狂熱分子，事情難以逆料。心理上的壓力與疑慮是很大的。在這幾年中，白樂日以他的堅定受到稱讚，這種堅定使他能不顧疲勞和緊張，繼續進行一些研究

工作……」❺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他才開始重新發表文章，第一篇重要論文，是對戰亂時代的知識分子的深刻研究，這篇文章收在本書第十四章。

在戰後年代，白樂日終於找到一個適合他才能的環境和位置。從事經濟與社會研究的（巴黎大學）高等研究實驗學校第六部是1947年建立的，他隨即被任命爲該部中國古代社會與經濟的新講座。在此後十五年中，他投入緊張的教學、科研與組織工作。在1953年和1954年，他發表了著名的對分裂時期（公元200—600年）的經濟與法律史的研究❻，在隨後的幾年中，寫了本書第一篇和第二篇中所收的論文。經與他的歐洲同事們商議，從1954年起，他主持一個大規模的共同研究計劃，目的是編出一部百科全書式的宋史指南（960—1279）。他在寫給合作者傳閱的第一份通知中，說明了這個計劃的宗旨：「這個計劃出自一個很簡單的想法，即要給人類卷數最多的史籍編一個現代的科學的詳細目錄，沒有下面兩個條件是不可能的：(1)適合西方學者要求有效、實用的工具書，(2)個人研究者的合作。」一些值得稱讚的出版物，就是在這個計劃的贊助下出現的，其中最有價值的，是白樂日自己編繪的詳盡並有充分文獻根據的宋代工商業生活地圖❼。在宋代計劃的工作中，在他自己的研究與教學中，在他將中國文明帶進歐洲思想生活的努力中，白樂日是一位不知疲倦和富有創造性的革新者。成熟、可靠、明智的中國學在西方的出現，主要應歸功於他。

可以看出，白樂日的一生大部分是在危機中度過的：大蕭條，法西斯主義的興起，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動亂，共產黨國家的出現，冷戰，戰後法國的政治危機。他度過這些動亂的時代，不是作爲一個超然物外的旁觀者，而是作爲一個有密切關係的深入參與者。他完全具備麥克·布洛克（Marc Bloch）所說的一個歷

史學家的主要品質：理解生活的能力。就白樂日來說，這種能力來自痛苦的經驗所產生的同情和偉大的分析才能——從事件的長河中提取值得注意的動向和勢力。他強烈地感受到當前的痛苦經驗的力量，從而形成他對過去的看法；他指出，偉大的漢學家愛德華·夏瓦納（Edouard Chavannes）❽如果活到二十世紀下半年，他就會從紀元前一世紀中國最偉大的歷史家寫給友人的信中，看到更多的悲劇意義，這封信「譴責專制國家加給臣民的凌辱，並透徹地討論了是否在專制制度下自殺的問題」。白樂日相信，西方在二十世紀的經驗，可以「使我們更好地了解中國過去的歷史，而對中國歷史的了解，則可以使我們明白那些令人不安的根深柢固的趨勢——極權主義，國家中心，官僚主義——當我們走向一個一體化的世界，每個地方都以同樣的節律搏動時，就可以看出這種趨勢來」。對白樂日來說，北京出現的新的中央集權專制國家，使他向後看清了他曾經研究過的現象，向前看見了它給人類的未來投下的陰影。今天比以往任何時候看得都清楚，中國歷史既不是異乎尋常的，也不是同別人毫無干係，而是整個人類的歷史和命運的組成部分。事實證明，研究中國歷史與文明的新方法是正確的：它不僅能幫助西方人士從陳舊的褊狹思想中解放出來，而且能幫助他們對現在和將來有更深刻的了解。這個看法和這種關注，貫穿在本書每篇論文的主題中。

對研究中國的意義的這個看法，表現在白樂日組織學習的態度中。他希望結束中國研究的傳統的隔離狀態，希望中國的經驗將成爲公認且對一切類型的學術研究都是必要的知識。他認爲要實現這一點，只有使中國研究變得更有活力、更富創造性、更順應現代世界主要關注的問題。儘管他欽佩法國偉大的中國學學者——馬塞爾·格拉內（Marcel Granet）❾、保羅·佩里奧（Paul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Pelliot) ⑩、亨利·馬斯佩羅 (Henri Maspero)，以及他的朋友保羅·德米厄維勒 (Paul Demiéville) ——他仍尖銳地批評傳統漢學的許多方面：把研究集中於古代和經典，對社會的基本問題與文化史缺乏關心，對次要問題的強烈愛好，他把這形容爲「在語言學的枝節上大作文章，在深奧難解的問題上耗費功夫，在考證無名氏的姓名以及其他種種無聊事情上鬥嘴」⑪。同時，他也提防各種「現代化」影響，把它們看作是對成熟、可靠的中國學的威脅：意識形態上的別有企圖，自稱能解釋一切的宏偉體系，「濫用學術界的行話」，幼稚的比較研究方法。1957年他滿懷希望地談到戰後歐洲的發展：

> 一個新傾向——研究近代中國的傾向——愈來愈明顯，特別表現在對唐以後（公元900年後）的經濟、社會和制度史問題的關注上。對新中國日益增長的興趣，人文科學中發展起來的普遍傾向，這兩方面都不會不給中國研究領域以影響，在這個領域中，專家們將不再能把自己局限在個人好奇心的小天地裏了。前一代對外部形式、獨特事件和邊境接觸的熱衷，正在冷却下來，代替它的是掌握結構、內容、重大事實及相互關係的願望⑫。

白樂日自己對中國社會結構的關注，集中在士大夫階級與它所控制的制度之間的複雜關係上。這個階級的成就和生存能力給他以深刻印象，但對它的依靠專制手段感到厭惡。那些習慣於不少著作中描述中國士大夫文化溫馨可愛的人，可能會對這些論文感到吃驚。但歷史眞實本就不如神話那麼美妙動人。白樂日發現士大夫階級生存上千年的根本原因，是它壟斷了某些基本的社會

職能，特別是對大規模公共工程的管理，對農業生產與分配的控制，對大小政府官員的調配。他促使我們注意士大夫用以保衛他們的壟斷的各種手段。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控制教育，他們成功地堅持了許多世紀的一個原則，是規定全面的人文教育是取得公職的唯一資格。這個原則他們從不放棄，因爲允許一個具有某種技術專長的人進入士大夫行列，那就是把門開得太大，會破壞他們所小心保衛的士大夫文化的同一性。

白樂日促使我們注意士大夫用以維持他們統治地位的許多政策和策略。其中之一是利用法律。儘管官方儒學總是譴責古典法家的過分，但儒家官員在藉助法律（常常是嚴酷的法律）作爲保證社會安定的手段時，却從不後人。正如白樂日說的，「儒家和法家在用嚴刑峻法對付下屬階級的必要性上是（而且始終是）一致的。他們的不一致是關於（法家所主張的）法律的普遍性問題，即不加區別地將法律用於貴族和平民，統治者和被統治者。把當事人分爲兩類的法律，它本身就不合法，在法律面前應當人人平等」[13]。儒家士大夫還從法家學說中採納了一個很合算的控制社會的方法，即保甲法。不論他們對一個根本上是不道德的制度有着怎樣的道德上的顧慮，對他們來說，這個制度在強迫順從上已經證明了的效用，究竟比什麼都重要。

由士大夫授意和起草的敕令和詔書，頒布了數不清的措施來控制可能向既定的力量對比發出挑戰的階層。在第四章，白樂日談到官方對商業活動的控制；在那裏以及別的地方，他指出士大夫階級怎樣通過徵稅、建立國家壟斷和施加政治壓力，想方設法阻止資產階級發展成爲一個能向他們權力提出挑戰的階級。白樂日還著重指出士大夫對集市、行會和城市生活的嚴密控制，特別是在公元1000年以前。除了這些法律的和準法律的手段之外，還

有裙帶關係和貪污。裙帶關係在儒家倫理中有着最大的合理性，它幫助保證士大夫的家庭延續下去，而貪污則可以用來達到同樣的目的，並且作爲削弱經濟上的暴發戶的一種非正式的榨取手段。

另一個主題是士大夫在形成中國經濟史上的作用，這個主題在他的早期研究中就開始了，它貫穿在這本選集的所有論文中。他把統治階級始終堅持以農業爲本和農村生活在道德上的優越，看成一部分是蠱惑人心，一部分是階級利益的表現。在成千上萬的奏議中一再重複的統治階級對農民及其生計的慈父般的關心，令人作嘔，白樂日指出，絕大多數土地改革措施，都是爲保證國家從地租中有更穩定的收入而制定的，因爲地租是政治秩序的主要依靠，它的主要受益者是士大夫。白樂日還認爲，儘管商人的生活方式始終受到官方思想家的斥責，認爲是不道德和不事生產的，但他們與士大夫在某些共同利益上有勾結，經常表現爲通過賄賂換取短期的讓步，此外，他們比農民子弟有較好的進入上層社會的機會。然而，決不允許商人發展成爲一個具有獨立地位的階級；他們可能得到暫時的讓步，但他們沒有權利或豁免權，而當他們似乎會變成一個階級，從而威脅到自古以來的制度時，他們的財產和企業就被接管。私人資本主義創始了無數企業，但它們早晚會落入國家之手。這樣，中國在進入近代時，只有很少的私人企業的傳統，却有長期的和各種各樣的國家資本主義的經驗。

白樂日對制度方面的興趣，引導他把儒學主要看成一種意識形態，即是說，一種用於解釋與論證一種政權體制的合理與正確的思想體系。在談到儒家標榜的主要美德「孝」（即「順從」，常常被誤譯爲「孝順」）時，他強調在中國的社會發展中，通過教誨和法律

懲罰反覆灌輸這種價值觀念的結果，看來他同意已故吳虞指出的結果，即「把中國弄成一個製造順民的大工廠」⓮。他對儒家的派別或儒學的歷史沒有興趣。他對經典的興趣，在於把它們看作是儲藏價值觀念的倉庫，這些觀念可以或已經派上了意識形態上的用場。他曾建議將經典及其注疏中的關鍵章節彙編成冊，因爲在討論國家政策中重複出現的問題時，這些章節一再被用來證明這個或那個觀點的正確⓯。他對儒家和儒學的看法，也許有時顯得苛刻，但這對那種平淡無味與華而不實的自我證明的做法，是一種有益的糾正，這種做法出現在許多中國資料和受它們影響的西方著作中。

白樂日在考慮中國的史籍時，一方面想透過道學冗詞的表面，看到它後面的意義，一方面注意發現少數倖存下來的文獻，它們坦率地談到一個決定或一項政策的眞正利益所在。讀者將在第十章的開頭，看到白樂日對傳統史籍的長處與局限的看法。這篇論文指出，歷史是當官的爲當官的而寫的，受到儒家意識形態的限制，這是傳統史籍最大的病根。白樂日對這問題的論證很有力，但正如我在別的地方曾經指出的，他有些忽視一些中國最偉大的歷史家的寫作動機，這同各地的歷史家是一樣的，即是要找出事情的前因後果⓰。人們可能認爲，白樂日把歷史編纂過多地看成是統治階級的工具了。但他在談到最後兩個朝代編纂的會典時，我們不能否認他的話是公正的：「這許多彙編……使人想到一部笨重而巨大的政府機器，儘管充滿官樣文章，有不少故障，却有效地運轉着。在這兒找不到這部高壓機器的犧牲品的痕迹……」

讀者會注意到，論歷史和思想的文章，集中在三國和南北朝時期。白樂日最初被這個亂世所吸引，無疑是由於他早期對道教

和佛教的興趣——這兩個傳統在這個時期的思想與宗教生活中起着支配的作用。那個時期的批評家、持不同政見者和各種各樣的無政府主義者也吸引着他，他們的思想比太平時期儒家思想家的思想遠爲廣闊。這些也許是引導他去研究一個被中國自己的歷史家（不論是傳統主義的或現代主義的）長期忽視的時代的原因。但除此之外，還有白樂日在本書第二章中所說的原因，「我們只能理解我們已經知道的東西，而且，我們只對打動了我們的東西發生眞正的興趣」。這個既定價值與既有制度崩潰的時代，這個熱切地企圖對一個混亂社會的疾病進行診斷和救治的時代，這個努力從傳統中搜尋一切可能的線索以便了解和採取有效行動的時代——這在本質上太像他自己所生活的時代。這就使他和他所研究的這個時代一脈相通。當他在法西斯恐怖和戰爭中進行這些研究時，避於中國西南一隅的大學中的學者們也在研究這同一個時代；他們之所以被這個時代所吸引，也是由於它與他們自己所生活的時代有明顯的相似之處：一個內戰的時代，外國入侵的時代，傳統文化崩潰的時代。

分別在幾篇論文中談到的後漢和南北朝時期的幾個獨特的思想家，說明白樂日把傳記方法作爲思想史的一種類型。在十三章中討論的三個後漢思想家，是挑選出來作爲說明在那個充滿危機的時代知識分子選擇範圍的例子。但白樂日發現他們還具有別的意義。由於他們反映出什麼地方錯了，他們就提供了他們各自的時代的重要信息——比官方檔案中記載得更詳盡、更不加掩飾。除此之外，他們是中國思想史上一個重要轉折的見證人：從一種與前此的傳統仍有聯繫的思想追求，轉到三世紀的思想開放。

關於中國三世紀思潮的論文（十四章），把機敏的分析與生動地再現一個社會及其上層人物所處的困境結合起來。除此之外，它

指出一個抗議運動怎樣隨着時間的推移而退化，「阮籍和嵇康等人的高度緊張狀態，這曾經是他們想超越人類限制的嚴肅嘗試的一部分，現在則退化到拋棄人生應有的禮貌和規範。瘋狂的追求解脫的欲望，變成了任性與輕浮，反抗的呼叫變成了玩世不恭的妥協，自由變成了放蕩」。

白樂日在他的文章中始終注意社會與思想史的密切關係。在介紹一個思想家時，無不談到他的社會出身與地位，無不努力去描述他生活與思想於其中的社會。在這些章節中，就同在研究制度的章節中一樣，我們看到白樂日對社會與政治生活的動力的關注，對過程與變化的關注。對思想的社會背景的分析，關注社會動力，是西方歷史研究中公認的方法。但在對中國歷史的研究中，這種方法還是比較新的，却十分重要。中國傳統的歷史編纂學，雖然極其豐富，但在對明顯的復現現象的公式化的陳述中，傾向於掩飾逐漸累積的變化，而黑格爾、馬克思以及其他許多人認爲中國社會是靜止的觀點，在西方根深柢固，因而認爲中國沒有「嚴格意義上的」歷史。值得高興的是，白樂日的開拓性著作在中國、日本、歐洲和美國的學者中，有了志同道合者和後繼者，現在，中國眞正的歷史開始出現了。

白樂日的歷史哲學通過這些論文可以清楚地看出來。儘管他堅持經濟與社會制度的重要性，但他並不使它們帶有歷史盲目力量的性質。他認爲，在中國也和在別的地方一樣，既定秩序的變革，是適應利益集團的需要，而人們則努力把繼承下來的東西去適應自己時代的現實。但變革的範圍，受到中國某些特殊歷史因素的制約：相對的孤立與自給自足的社會，社會習俗和思想方式巨大的惰性，歷史慣例累積起來的沉重負擔。這樣，每一代人都面臨一系列選擇——在分裂的時代，選擇的範圍更寬些，但始終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